

东北民族研究

南文渊 主编

第五辑

辽宁民族出版社

014032855

K280.3-53

01

V5

东北民族研究

南文渊 主编

第五辑

辽宁民族出版社



K280.3-53
01
V5



北航

C1721087

© 南文渊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民族研究. 第5辑 / 南文渊主编.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497-0696-9

I. ①东… II. ①南… III. ①少数民族 — 民族历史 — 东北地区 — 文集 IV. ①K28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1549号

东北民族研究.第五辑

DONGBEIMINZUYANJIU.DIWUJI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第三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2

字 数: 210千字

印 数: 1-1000

出版 时间: 2013年11月第1版

印刷 时间: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佟 强 王哈申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李 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97-0696-9

定 价: 35.00元

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网 址: www.lnmzcbbs.com

举报电话: 024-23284336

邮购电话: 024-23284335

联系电话: 024-23284340

淘宝网店: lnmz2013.taobao.com

目 录 MULU

清太祖名讳汉字写法考论	张佳生 / 1
巴尔虎人驻防辽宁之踪迹	黑 龙 / 7
游牧民族对外经济交往探微	
——以汉唐北方游牧民族为中心的考察	孙 静 / 14
红山文化区域古代遗物、遗迹研究	包和平 徐子峰 / 23
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	李 鸿 / 62
少数民族自治区建立“民族特色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研究	南文渊 / 70
延边：以企业思路谋划农场发展	孙 焱 / 77
延边朝鲜族农村人口老龄化与权益保障制度研究	
——基于“土地换保障”的视角	孙 焱 朴婷姬 / 82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教育的政策保障研究	
——以朝鲜族为例	朴婷姬 陈子华 / 91
东北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研究	南文渊 / 101
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变迁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	朱 军 / 114
新疆锡伯族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之要因探寻	关 伟 / 125
关于辽宁满族文化繁荣发展问题的研究	孙 静 李世举 / 134
物我同构，生生和谐	
——东北渔猎民族服饰、器具图案的文化解读	戴嘉艳 / 149
我国滨海区域生态安全演变与对策：	
以大连金州新区为例	于成学 孙志梅 / 155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媒介生态研究	于凤静 / 161
人神的亲密与疏离	王 艳 / 175

清太祖名讳汉字写法考论

张佳生*

摘要：自明末以来，清太祖名讳的汉字写法至少有6种，依时代之不同和政治局势之不同多有变化，如何规范书写清太祖名讳，时至今日认识仍然未能统一。今人多写作“努尔哈赤”或“努尔哈齐”，且流布甚广，殊不知清朝时即有官定写法，即“弩尔哈齐”，此3种写法并非仅一字之差那么简单，其中蕴含了民族的、时代的、政治的多种因素，故如何正确书写清太祖汉字名讳，不仅是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史实的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提出了以“弩尔哈齐”为正规写法的看法。

关键词：清太祖 名讳 弩尔哈齐

自满学研究再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相关的学术研究著作与论文，并且出现了大量有关满族和清朝历史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其中涉及清太祖名讳的汉字写法处甚多。学术著作或写作“努尔哈齐”，或写作“努尔哈赤”，而文学艺术作品则一律写作“努尔哈赤”，甚至一些词典如《中国历史人物词典》也写作“努尔哈赤”。因为文学影视作品和词典流布更为广泛，故“努尔哈赤”之写法广为人知，写作“努尔哈齐”反不知其为何人。在学术界，写作“努尔哈赤”和写作“努尔哈齐”的学者各执己见，各自坚持自己的写法，致使清太祖的汉字名讳不能统一，而更多的人没有认识到正确书写清太祖名讳的重要性，认为如何书写清太祖名讳无关紧要。两种写法看似只有一字不同，实际上并非仅一字之差那么简单，从这两种写法出现的时间看，都不是最原始的写法，也不是最规范的写法。简而言之，“努尔哈赤”源于汉族的译法，“努尔哈齐”则源于满族的译法，两者的出处和来源不同。不过这两种写法都有率意为之嫌，无论从语言角度还是历史角度看，均不具有严谨性和权威性，都算不得规范，故对这

*作者简介：张佳生，原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为大连民族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兼职教授。

一问题无论是从史实角度,还是从学术的角度都有辨析清楚的必要。

清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对他名讳的汉字写法自然不能等闲视之。汉字所记清太祖名讳是从满语转写而来,满语的罗马字母标音一般写作“nurhaci”,那么如何用最接近满语读音的雅致的汉字书写就显得非常重要。自明清以来一直到今天,清太祖名讳汉字书写方式有多种,研究清史或满族史,甚至进行文学影视创作都避不开书写清太祖名讳,弄清楚其名讳的汉字书写方式怎样才算最为规范,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应该说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尊重历史的问题。

关于清太祖名讳的汉字写法,自有记载以来便有不同。清太祖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不数年间势力即逐渐强大,他对女真诸部的频繁征伐,引起了明朝和朝鲜的关注,清太祖的名讳开始出现在明朝和朝鲜官私史书中。他名字的汉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明实录》中,而后朝鲜人、满族人记其名讳的汉字写法开始出现,但各自的汉字写法各有不同,其中满族人的汉字写法最应受到重视。这不仅因为满语是他们的母语,也因为对他们来说清太祖是整个民族最崇敬的领袖,对他名讳的汉字书写方式绝不会率意为之,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至于外族人书写其名讳,则不会如此认真,甚至会采用带有贬义的汉字。

在今天能查到的中外史料中,记载的清太祖名讳汉字写法,归纳起来至少有6种。这6种写法虽然读音相近,但用字各有不同,距满语本音亦有远近之别,参照满语本音,仍以满族人的转写最为贴切,也最为恰当,他们对清太祖名讳的汉字转写方式与态度,也表现了自清初以来满族对清太祖名讳汉字译法的重视与慎重,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

现将清太祖名讳的6种汉字写法情况,按出现的时间顺序条述如下,从中可见这些写法的同与不同,以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与区别。

其一,写作“奴儿哈赤”。在汉人史籍中,最早记载清太祖名讳的史书是明朝的《明实录》,其中将清太祖名讳写作“奴儿哈赤”。《明神宗实录》卷190,万历十五年(1587)“十月丁丑”中,记载了明朝欲剿灭清太祖之事:

部复:逆酋结连丑类,明肆侵袭,而东夷奴儿哈赤且同北关之谋,在歹商为木之有蠹,在二逆为虎之有翼,王辄应降调以为他备之戒,其猛骨孛罗封赏合行尽革,并将其母温姐及奴儿哈赤、那林孛罗等,行抚镇便宜相机剿处。上命逮治王辄,余如议。

清太祖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至万历十五年（1587）已经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部，并于佛阿拉筑城称王，正是其势力渐张之时，故特别受到明廷的关注并被记于《明神宗实录》之中。在此之后，《明实录》中凡涉及清太祖名讳处，皆写作“奴儿哈赤”。这种汉字写法与满语读音相近，唯“奴儿”二字含贬斥之意，“赤”之读音距满语读音较远。此外，明朝的其他官私史书著述亦皆写作“奴儿哈赤”，或简称为“奴酋”，这种写法在朝鲜史料中也可见到，作为属国大约是受到了明朝书写方式的影响。

其二，写作“老乙可赤”“老可赤”或“老罗赤”。此写法主要见于朝鲜官私史书。朝鲜《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万历十七年（1589）“七月丁巳”中，记载清太祖名讳为“老乙可赤”：

平安兵使书状：满浦呈内，建州卫彼人童坪者等十八名，童海考等十六名，童多之等四十八名，归顺出来言内：“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为麾下。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间练习，协制群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将为报仇中原之计”云云。

此外，朝鲜《光海君日记》中有记“老可赤”之文，此书中“老可赤”应为“老乙可赤”之省文。此书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中记载：

建州夷酋佟奴儿哈赤，本名东靺，我国讹称其国为老可赤，此本酋名，非国名。酋本姓佟，其后或称金，以女真种故也。

“佟奴儿哈赤”是言其姓为佟氏，“奴儿哈赤”则取自明朝的译法。朝鲜史书中还有记为“老罗赤”者。如朝鲜佚名《北路记略》“清人始起”一节中记为：

忽刺温所居十五日程，有老罗赤疆域，欲并忽刺温，以其女妻之。

实际上在朝鲜语中“老乙可赤”“老可赤”“老罗赤”等，皆为一音之转，“忽刺温”即女真之扈伦部。总之这几种译法与朝鲜语发音特点有关，故与明朝史书的写法有所不同，与满语读音距离更远。

其三，写作“弩儿哈奇”。此写法见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这是最早写成的一部清实录。此前成书的《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均无有关清太祖汉字名讳的记载。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于皇太极执政后的后金天聪年间开始纂修，成书于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其中汉文写本在卷一记述清太祖家族谱系时，用汉字记载了清太祖名讳。书中记太祖之祖父觉常刚以下世系时云：

觉常刚第四子塔石，嫡夫人阿姑都督长女，姓奚塔喇，名厄墨气。生三子，长弩儿哈奇（即太祖——原注），号淑勒贝勒（淑勒贝勒华言聪睿王也——原注）；次名黍儿哈奇，号打喇汉把土鲁；三名牙儿哈奇。

此书成书之后，设大驾卤簿，举行了隆重的庆贺典礼。这部书中清太祖名讳的汉字写法应该得到了太宗皇太极的认定，是清政权最早的官方汉字书写方式。这种写法与明朝和朝鲜史书的汉字写法都不相同。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此书撰写者除了八旗汉军人罗绣锦、王文奎等之外，满族人也参加了撰写，其中有内国史院大学士希福、刚林，学士詹霸、胡球，员外郎苏开、札素喀、吴巴什等。由于有满族人参加撰写，一定不会对清太祖名讳的汉字写法极为慎重，故而这种汉字写法应该是当时最接近满语读音的一种汉字标音写法了。

其四，写作“弩尔哈齐”。大清八旗入关之后，建立了中央政权，清太祖名讳的汉字写法修正为“弩尔哈齐”，这种写法最早见于清朝玉牒、《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和康熙帝所撰《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碑文。

有清一代，皇族制作玉牒以记载历世历代家族成员人口，玉牒实际上是皇族爱新觉罗氏的家谱。此玉牒自顺治十八年（1661）创制，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止，玉牒中以汉字书写的清太祖名讳均写为“弩尔哈齐”。

自康熙朝开始，重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为《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书中记清太祖为“弩尔哈齐”。清太祖之福陵所立《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为康熙帝亲撰，在此碑文中康熙帝也将清太祖名讳写作“弩尔哈齐”。碑文中有关部分的原文如下：

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
姓爱新觉罗氏，讳弩尔哈齐。先世发祥长白山之阳，禎符神贶，
历著休征。至皇始祖肇祖原皇帝，式廓旧业，寔炽寔昌。又五传

至显祖宣皇帝。世济其勤，流长积厚，景运懋集，神器攸归，诞启我太祖高皇帝，显祖之长子也。

此碑文结尾记云：“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孝曾孙嗣皇帝玄烨谨述。”碑文中清太祖的汉字名讳与玉牒的写法一致，故这种写法是大清全国政权建立后朝廷确定的规范写法，应该最具有权威性。“努尔哈齐”与“努儿哈奇”用字有所不同，但读音一致，都最接近满语本音。以“尔”换“儿”，以“齐”易“奇”，从人名尤其是帝王名讳角度看，这种写法更为稳妥雅致。如果从政权性质角度看，入关前写作“努儿哈奇”时尚属地方政权，写作“努尔哈齐”时已经是全国中央政权了。在此期间，对其弟及族人乃至诸将的汉字写法也作了重新规范，如其二弟原写作“黍儿哈奇”，三弟原写作“牙儿哈奇”，后改写作“舒尔哈齐”和“雅尔哈齐”，如此等等。这是入关后制定和规范一系列制度，如职官、服饰、法律等制度中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出于对祖先和先辈的尊重，同时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因此这种写法更为稳妥也应更具有权威性。

其五，写作“努尔哈齐”。此写法见于《清史稿》，《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纂修，至1927年完稿，1928年出版。《清史稿》“太祖本纪”开篇即言：

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姓爱新觉罗氏，讳努尔哈齐。

《清史稿》中的这种写法明显的是源于前一种写法，读音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读音相同，但是用字不同，虽亦贴近满语本音，然不顾清朝官定写法定例，以“努”易“努”，实无道理也无依据，且易造成混乱。《清史稿》应属官修史书，对清太祖名讳的汉字写法理应持严谨态度，遵照清代官修史书予以转写，但《清史稿》之纂修是在清帝逊位之后，且修史者中多有清朝遗老，改写清太祖名讳写法或有避讳之意亦未可知，尽管如此，无论是出于笔误还是出于有意，均属不确。时至今日，这种写法仍被一些学者坚持倡导，虽明知清代对清太祖汉字名讳有规定写法，然仍舍清代玉牒和清圣祖亲撰碑文而认同出书甚晚的《清史稿》，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六，写作“努尔哈赤”。此写法起于现代，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学术教育界的一些学者多将清太祖汉字名讳写作“努尔哈赤”，这种写法更是一种想当然的产物，后被史学、文学和影视界采用，遂广泛流布。

这种“努尔哈赤”的写法与明代史书“奴儿哈赤”的写法读音相同,似为“奴儿哈赤”写法的变体,是汉语读音的典型译法,不过字面稍微雅致而已。但是“努尔哈赤”的写法不仅无所依据,而且是最为晚出的一种写法,不仅极不规范,而且造成了更多的混乱,然不知何故,却一直被一些清史学者采用。如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教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用的《明清史讲义》“合各记载所详之清世系”表中,就将清太祖名讳写作“努尔哈赤”。其他一些国内外学者也多有采用此写法者,近年来颇为流行,以至于当今写清太祖名讳为“努尔哈赤”者十之八九。

清太祖名讳的汉字写法虽然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却也并非无足轻重,他被尊为开国之君,庙号“太祖”,历史地位十分重要,至今在学术研究和文学作品中也被常提到,故其汉字名讳应该有统一的写法。杂乱无章,莫衷一是,或者随意书写,毕竟不是应该有的严谨态度。即使有人非要执意写作“努尔哈齐”或“努尔哈赤”,也应该知道这种当今流行的写法也是史学界并不规范的写法。

在上述6种汉字写法中,最为规范、最为权威、最为恰当的写法应该是“努尔哈齐”。这种写法不仅来自于满族人自译,而且出自“玉牒”,康熙帝亲撰的《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属于大清中央政权官定之规范写法。其他的汉字译法不仅随意性较大,各立门户而制造混乱,且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对清太祖认识的不同,故其他写法自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而从今人从今不从古的选择来看,似有失史学传统与史家风范之嫌。

巴尔虎人驻防辽宁之踪迹

黑 龙*

摘 要：康熙三十一年（1692），部分巴尔虎人迁居辽宁地区，被安插于满洲八旗，开始了新的生活。数百年以来，他们顽强拼搏，生生不息，在辽宁这片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并与满、锡伯、汉等民族和谐相处，共同为国防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巴尔虎 辽宁 八旗 驻防

巴尔虎是蒙古古老部落之一，起源于巴尔古津脱窟木地区，即今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尔古津河流域。巴尔虎之名，最早出现于突厥阙特勤碑文上，称“拔野古”，《旧唐书》和《新唐书》亦称“拔野古”。《元史》称之为“八儿浑”，《蒙古秘史》称之为“八儿忽”，《史集》称之为“巴儿古惕”。明代文献称“把儿护”“巴尔古”“巴儿勿”，清代统称为“巴尔虎”。现在巴尔虎人多数居住于呼伦贝尔草原，少数分布于锡林郭勒、赤峰、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区以及蒙古、俄罗斯等国家。本文根据笔者的田野考察，结合文献记载，就辽宁特别是大连地区巴尔虎人的情况作一初步探讨。

康熙二十七年（1688），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击溃喀尔喀三汗部，部分巴尔虎人随车臣汗南下漠南蒙古，在张家口边外、科尔沁以及木兰围场等地辗转迁移。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起，清政府将上述地区的巴尔虎人陆续派往盛京、吉林、齐齐哈尔、墨尔根、布特哈、察哈尔等地驻防。雍正十年（1732）和雍正十二年（1734），又分别从布特哈和漠北蒙古

*作者简介：黑龙，蒙古族，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清代东北民族关系若干重大史实研究”（ZJ12RWZD007）和辽宁省高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清代满蒙关系及其变迁研究”（2009R12）的阶段性成果。

车臣汗部迁移巴尔虎人驻防呼伦贝尔,成为今天的陈巴尔虎和新巴尔虎蒙古。

在各地的巴尔虎人中,辽宁地区巴尔虎人的历史尤其引人注目。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不断变迁,族群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深入研究辽宁巴尔虎人的历史,不仅在历史学、民族学上意义重大,而且具有十分深远的人类学意义。笔者在大连工作,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更多地关注大连地区巴尔虎人的历史与现实,在巴尔虎人居住地和巴尔虎人曾经驻防过的地方进行了探访,获得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

关于辽宁巴尔虎人的来历,学界已有报道。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都兴智教授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发表“巴尔虎蒙古源流考”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巴尔虎人的起源地、南迁以及被清朝安置于各地的过程。其中,对巴尔虎人驻防辽宁的情况也做了较为清晰的记述。2006年,呼伦贝尔学院长海先生在《呼伦贝尔日报》上发表“辽宁的巴尔虎旗人”一文,介绍巴尔虎人驻防辽宁之经过。上述二文均引用了大连瓦房店市驼山乡发现的巴尔虎人赫姓先祖碑和《巴尔虎本源考》(手抄本)^①等珍贵史料。赫姓先祖碑碑文如下:

巴尔虎系驻防,原籍卡勒卡四部落七旗。男妇共五千余口,壮丁一千二百七十三名,移奉天辽阳以迤西,沿太子河已致皇泥洼、牛庄,有牧场,堪可处所插营。若至冬季,办给房间居住,难于养活牲畜。如牲畜稀少,不能插营者,著交指派各城地方官,酌量暂行办给房间居住等语。由奉天将军奉请,领其披甲。于康熙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奉圣旨,依议著塔旺扎布袭为二等佐领,额尔得尼代青、卡勒唐袭佐领,钦此。著百丁为一佐领,每佐领领催兵五十五名,余下作为附丁,归上三旗兼管。由此选其堪挑佐领者拟以陪奉请引见,编为十佐领,拨往复周、熊岳、辽阳、开原、岫岩、凤凰城、金州各一佐领,奉天三佐领。

民国十年十月初六日敬立

此碑文与《盛京通鉴》等官书记载相吻合,其史料价值毋庸置疑。碑

^① 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民族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巴尔虎本源考》,达桑阿撰。达桑阿,今瓦房店市巴尔虎人,曾任凤凰城巴尔虎佐领,是巴尔虎人中汉文化水平较高的文士。

文提到的塔旺扎布、额尔得尼代青、卡勒唐三人，也见于《巴尔虎本源考》一书。^①巴尔虎人驻防辽宁的十个佐领中，复州、金州、岫岩三地为今天的大连地区，赫氏碑文正是从复州（今瓦房店市）驼山乡双山村发现的。碑文虽然没有交代巴尔虎人进入辽宁之原因，但清代官书留有记载。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朝议政王大臣议奏：“巴尔虎人生计艰难，请移往盛京等处披甲吃粮，以期有益。”可见，清政府鉴于颠沛流离、生计艰难的巴尔虎人之请求，将其安插于满洲八旗。当时，迁到辽宁的巴尔虎人多以“巴尔虎”三字命名新居地。现已掌握的材料证明：开原巴尔虎人后裔主要居住在今开原市金沟子乡巴尔虎营子村；辽阳巴尔虎后裔居住在今辽阳城南达子营和首山达子营两处；复州巴尔虎后裔居今复州城北双山村（赫家营子）和城西的东、西巴尔虎村，有康、寇、赫、韩、卜5姓；金州巴尔虎后裔居今金州城西北七顶山满族乡，有车、白等姓；岫岩巴尔虎后裔居今庄河市吴炉镇巴尔虎村和太平岭满族乡土城子和岫岩县巴尔虎胡同等地，有寇、白、石3姓；凤凰城巴尔虎人初驻今凤城市城东南蒙古营子，后移居城西南，有敖、吴、马、何等11姓。^②

巴尔虎人进驻辽宁后数百年来，特别是有清一代，其生产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呢？对此，地方史志、谱牒资料以及民间传说能够提供大致脉络。明末辽东战事频仍，居民或死亡或逃散，村落萧条，地荒人稀。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朝采取“拨兵实边”政策，金州、复州等地才兵民日增，渐成州县规模。然而，广大乡村仍是荆棘遍野，人烟稀少，大片荒地没有开垦。金复等地巴尔虎老人中流传其先祖初来落户时“打马占山”和“跑马圈地”的传说。如复州巴尔虎蒙古韩姓所居的东、西巴尔虎村周围是一片沃土，最初即被韩氏先祖所圈占。西巴尔虎村西北是满族郎姓居住地，再往北是锡伯族关姓居住地。当年，韩姓先祖曾与满族、锡伯族在那里划界占产，于是形成今天的东、西巴尔虎村。^③巴尔虎人初来辽宁时还不会种地，“占山”“圈地”，应是用于放牧和渔猎。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向满人、汉人学习种地，才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满足生活需要。

巴尔虎人进驻辽宁之初，操蒙古语，随后接受了满语和汉语，这在他

① 据都兴智教授查证，赫氏先祖碑文应抄自《巴尔虎本源考》一书，而《巴尔虎本源考》碑文部分，应是引自《盛京通鉴》卷3。因此，《盛京通鉴》对巴尔虎人驻防辽宁的记载最为原始翔实。《盛京通鉴》，现藏于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② 都兴智：“巴尔虎蒙古源流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③ 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民族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50—351页。

们的谱牒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很多巴尔虎人迁居辽宁之后前几代先祖的名字几乎都是蒙古名,后来满语名和蒙汉、满汉合璧名多了起来。应该说,辽宁的巴尔虎人原来说的是蒙古语,刚迁来时首先向满人学习满语,接受满族文化,甚至现在称父亲为“阿玛”或“玛玛”,称母亲为“额娘”或“讷讷”,与满族相同。然后,巴尔虎人向汉人学习汉语,取汉名较为普遍。如庄河寇姓第四代祖巴彦太,汉名寇率忠;巴彦布,汉名寇率平。^①目前,我们尚不知驻防辽宁之巴尔虎人接受教育的详细情况。据史书记载,巴尔虎人南迁辽宁后,清政府只允许他们参加武举考试,而不准应文举。后经过巴尔虎人积极争取,至嘉庆年间,清政府允许他们参加文科考试,取得了与满、汉民族同等的考试权利,文化水平不断提高。^②清末至民国年间,在俄、日殖民统治和北洋军阀、国民党的统治下,辽南地区的巴尔虎人与其他各族同胞一样,经济贫困,文化教育落后,大多数人读不起书而成为文盲。在习俗方面,巴尔虎人还保留了蒙古人的旧俗。例如生小孩不庆满月,也不庆周岁,这是与汉、满两族明显不同的习俗。然而,他们在其他很多方面受满族影响较深,直至现在很多社交场合中的礼节都与满族相同。有清一代,法律“禁蒙古、锡伯、巴尔虎佐领下女与汉人结亲”,^③所以巴尔虎人多与满族、锡伯族相互娶嫁。直到民国以后“旗民不婚”禁令被取消,巴尔虎人才可以与汉人通婚,但这已是很晚的事情了。^④

二

为了追寻巴尔虎人驻防辽宁地区之踪迹,并了解其后裔的状况,笔者于2012年6月30日赴庄河市吴炉镇光华村东北的巴尔虎营子,进行实地考察。

吴炉镇光华村距庄河市区10公里,我们考察组一行4人,在《庄河记忆》杂志主编周美华女士的陪同下于6月30日上午前去光华村,村委会主任包生贵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迫不及待地询问此地有没有蒙古人,包主任回答说,我们光华村由9个自然村组成,人口四千多人,其中没有一个蒙古人。我提出查看户籍簿,包主任十分肯定的回答没有一个蒙古人。接着我

① 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民族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52页。

② 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民族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748。

④ 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民族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54—355页。

提到“巴尔虎”这个名称，他说“东北方向1公里左右就有个屯子叫‘巴尔虎’，不知道什么意思”。随后，包主任叫来了一位腾姓七旬老人，请他回答我们的问题。腾先生说：记得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巴尔虎营子住着寇姓蒙古人家，他们家六间房子现在还在。寇家成年男人都在城里当差，妇女、老人和儿童在巴尔虎营子的家里。他们比较富裕，有很多土地租给汉人种，收成时这些妇女穿上旗袍，赶着马车，挨家挨户收租，显得特别富贵显赫。在我十几岁时，她们一夜之间都不见了，后来听人们讲，土地改革运动掀起，政府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这些妇女带着老人和孩子进城找他们男人去了。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没有蒙古人了，只留下了他们的六间老房和北山脚下的寇家墓地，还有巴尔虎这个地名，我带你们去看一看他们的老房和墓地。

通过查访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此地巴尔虎人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来这里到1947年土改，在这里生活了255年。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与满人生活在一起，接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并逐渐满化。后来，随着满人的汉化，他们也经历了从满化向汉化的演变过程，但保留了蒙古族和满族的一些文化习俗特点。例如在巴尔虎当地至今有吃手把肉、喝羊汤的习俗，而寇家的房子和墓地有满人的文化特征。

虽然此处的巴尔虎人在历史的烟云中无踪无影，但是文献记载、民间传说和历史遗物，依然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变迁的大致脉络和一些耐人寻味的情节，而他们的这种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历史的演变轨迹。

此次考察，未能见到巴尔虎人的后裔，心中总有遗憾。于是我查阅大连市地方史志资料，并与《大连市志·民族志》的撰写者辽宁师范大学都兴智教授取得联系，向他进一步了解大连地区巴尔虎人的情况。都先生为了编写大连市民族志，曾经走访过大连地区巴尔虎人居住区，在瓦房店市驼山乡双山村发现巴尔虎赫姓先祖碑，并在民间发现《巴尔虎本源考》（手抄本）一书，且撰文在国内报道上述两部文献资料，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根据都兴智先生提供的线索，我们考察组一行三人于2013年7月29日，驱车前往瓦房店市驼山乡双山村（复州老城西）进行了考察。与庄河市吴炉镇巴尔虎村相比，这里巴尔虎后人聚集，全村一千余人中400人是巴尔虎人，分为赫、韩、寇、康、卜5大姓。该村以赫姓居多，因此亦称赫家营子。而临近的东、西巴尔虎村韩姓巴尔虎人较多。这些姓氏几乎都是以其先祖名字的第一字为姓的，赫姓第一代族名温札力，任佐领，其子名赫翁阿，赫家后代即以赫字为姓。我们采访了小学教师赫永贵、村会计韩家臣、工人康连祥。赫永贵是温札力的第十代孙子。赫姓先祖碑传于他们

家，十多年前折断成两截，并被扔弃。在损坏之前，赫永贵复制碑文并复立碑于曾祖父墓前，使碑文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据赫、韩、康等人介绍，在“文革”之前，每家都有家谱，在“文革”中被损毁殆尽，然而有人将家谱中的谱系名单抄录下来，“文革”结束后纷纷编制家谱表，现在每家几乎都有这样的家谱表，从中可以窥见其家族演变的脉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连地区的巴尔虎人在民族识别的时候，几乎都报满族，所以现在他们也都按满族来确认自己的民族成分。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是蒙古族，对蒙古族的认同意识淡薄，历史记忆比较模糊，他们只知道自己是从“喀尔喀四部七旗”过来，但是不知道“喀尔喀四部七旗”在哪里。在学术界对巴尔虎人的民族身份的表述也有矛盾和纠结之处，《大连市志·民族志》满族篇将巴尔虎人作为满族来加以记述，而蒙古篇将巴尔虎人作为大连地区蒙古族的主体来编写的，这也许体现了巴尔虎人的复杂身份和特殊的演变历史。

巴尔虎人的足迹遍布整个辽宁，从辽北重镇开原到中心沈阳，辽东半岛沿海的主要城市均有巴尔虎人驻防。现在“巴尔虎”作为地名和基层单位名称而被广泛沿用。巴尔虎人顽强拼搏，生生不息，在辽宁这片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并与满、锡伯、汉等民族朝夕相处，相依为命，为辽宁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和谐共进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也涌现出一批优秀人物。例如，寇文光，今庄河市寇半沟人，清代举人，曾在岫岩厅做官，颇有名望；韩家贵，今瓦房店市驼山乡东巴尔虎村人，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外大使，其侄韩延武在台湾任军事教官；赫文礼，今瓦房店市驼山乡双山村人，读二十余年书，人称“二先生”，曾在山西军阀阎锡山手下当秘书。^①

三

巴尔虎人进驻辽宁已有321年的历史。当时，五千余人分为10个佐领，驻防8个城市，在沈阳有3个佐领一千余人，其他7个城市平均五百余人。在数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他们经过了由蒙古满洲化，再由满洲汉化的过程，其经济生活由游牧业转向农业和渔业。清政府设立“巴尔虎衙门”单独管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们的权益，巴尔虎衙门成为八

^① 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民族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63页。

旗之外的一个特殊行政组织，被称为“第九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巴尔虎人驻防辽宁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朝政府对蒙古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即“分而治之”，辅以“怀柔”，而前者是目的。尽管文献资料记载当时清政府为解决巴尔虎人的生计而将其安置于辽宁地区，然而从安置的方式看，绝非仅仅是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明显具有分割瓦解之意，进而从根本上消除其反抗清朝的能力。与此同时，作为蒙古的组成部分，巴尔虎人毕竟是满洲人的盟友，所以清朝政府以“满蒙一家”之情，优待巴尔虎人，使其免遭歧视。

在漫长岁月中，巴尔虎人虽然满化和汉化较为严重，但仍保留了本民族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成为区别于其他族群的人类学特征。例如蒙古族体质特征依然明显，因为一直到民国，禁止蒙汉通婚，只有与蒙古内部或满族、锡伯族之间通婚；吃手把肉、喝羊汤等饮食习惯保留至今；为人诚实，性格直爽，热情好客之特点依然可见。